农耕文化:乡村振兴的伦理本源

曹东勃,宋 锐*

(上海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作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线,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浓厚的现代性意蕴。而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悖论召唤着传统农耕文化的返场,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育现代性、融入现代性、扬弃现代性。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是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的精华,汇聚着中华民族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相处的伦理智慧,集中体现为“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法则,“父慈子孝、耕读传家”的家庭美德,“同甘共苦、守望互助”的乡邻关系以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充分发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契合乡村振兴伦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其内在张力,探寻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之道,对于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意义深远。

关键词:农耕文化;农业伦理;“三农”问题;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9;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3-0144-10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2018 年的农历秋分日,中华大地迎来了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在国家层面第一次为农民专门设立节日。作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中国农民丰收节”以节庆活动为载体,旨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2]。中华优秀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群众基础,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融入现代性、扬弃现代性”[3],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彰显“中国方案”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进步性,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生悖论与传统农耕文化的“返场”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念兹在兹、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目标,也是新中国 70 年发展进程的一条清晰主线。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政府就明确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一项国策,其中就包括农业的现代化。2017 年党的十九大对这一传统说法做了进一步完善,即“农业农村现代化”。韦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理性为世界祛魅、理性为自然立法的过程,即“摈除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或行为运动[4]。

农业现代化,是现代性逻辑在农业这一人类最

收稿日期:2019-09-27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0.03.17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青班专项(2018FZX02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CXJJ-2019-451)

作者简介:曹东勃(1983—),男,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通信作者

古老的产业之中延展进而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斯科特专门考察了现代性进入农业领域并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历史，他将之追溯到 18 世纪普鲁士的科学林业[5]。这种农业的现代化或理性化，往往要求运用科学技术、使用机械设备，仿照工业流程管理的模式，对农田、水利、品种等方面有序开发和规训。“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这一切根本性地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空间、再造农业的生产种植流程。狭义上的农业现代化，指向的是满足人类持续增长的粮食需求和扩大粮食产量这个最终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传统状态下农业生态的多样性、系统性被弃之不顾。近代自然科学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为现代农业赢得了巨大产出。通过不断扩大单一作物的种植面积和过度依赖农药化肥等工业品的投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结构被彻底打破，利润最大化法则的普遍介入，也将农业从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一阶段导入到一个以盈利为目的、未有穷期的新阶段。正如现代科学表现为一种分解式、还原论的范式一样，现代农业也把农业这一对象做了类似的孤立式处理[6]。由此，农业现代化以来的各种环境污染与破坏，某种程度上与农业性质的上述改变密切相关。

农村现代化，意味着以现代性的理性法则重构农村传统社会和生活的基本规则。金观涛将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基于个人本位的民族认同，作为理解现代性的三个核心元素。在三者的共同影响作用下，产生了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个体化。个体化意味着阶级、性别、社会地位、家庭、邻里等社会集体范畴的弱化[7]，不再被固着在土地上的农民，有了更多获取收入的方式，也因此逐渐脱离原有的以紧密依赖血缘关系等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结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之种种新的要求和规约也不断加诸于个体的生活场域，“个体深嵌于家庭网络和亲属关系中，个体被国家从宗族和社区的权力中解放出来又重新嵌入到社会主义再分配体系中，即农村的集体或城市的单位”[8]。现代性要素的渗入，货币、资本、财富观念和经济理性的觉醒，既能以货币结算的方式更替传统农业生产中的某些交换和互助形式，也足以打破传统农村生活中存在于人际交往中温情脉脉的种种潜规则。近些年来乡村社会中所谓“天价彩礼”之乱象，本质上就是现代货币化生存世界中的一种典型非理性行为[9]。

农业农村现代化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也极大促进了农民个体的解放和发展。然而，按照马克思所描摹的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三部曲来看，也只是完成了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飞跃。旨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方案，离不开反身自顾，从传统文化与礼俗习惯中汲取营养，进而对快速的现代社会变迁施以约束。因为，真实世界中的现代市场竞争的烈度是有限的，它以绝对稀缺为基本预设。而市场的调节仍可能取决于习俗、惯例产生的自愿行动。因此，当竞争成为市场的基本动力系统之后，习俗依然能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学的假设“不是在自然里预先规定的，而是在市场交易行为者的习俗和习惯里预先规定的”[10]。理解中国当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作为中长期过程之重要手段的乡村振兴战略，也需要在充分洞见其内在悖论的基础上，厘清传统与现代、文化演化与文明发展、演化理性与建构理性等诸多关系，从传统文化精粹中汲取养料，发育现代性、融入现代性、扬弃现代性。所谓“礼失求诸野”，当现代化浪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乡村裹挟其中，让人手足无措甚至生发“娜拉走后怎样”之问时，从传统文化中找寻更深层次的理念、知识和制度，便成为一个当然选项。“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护好国家、民族永续发展的根脉。”[11]在这个意义上说，挖掘传统农耕文化的本质内涵，剖析传统农耕文化契合乡村振兴的伦理向度，展望传统农耕文化嵌入乡村振兴的现实之道，大有裨益，正当其时。

二、传统农耕文化的伦理内涵及其发掘

农业农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既是生命的逻辑，也是生态的逻辑[12]。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长达万年的农耕历史进程和耕耘畜养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相处的独特伦理智慧，培育出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传统农耕文化绝不仅限于单纯的技术或产业，而是深深浸润和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思想观念，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本质内涵[13]。

（一）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道法自然、和谐共生

自然界是人类的诞生地，也是农耕生产的活动

场所,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践构成农耕生产的主要内容。世世代代的劳动生活让人们懂得尊重自然,深谙“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14]456,讲究“天时”“地利”成为农耕民族真实朴素的语词表述,“不违农时”潜移默化为中华民族农业伦理的基本认知[15]。“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16]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自然界并不是一个外在于人,需要彻底征服、允许肆意改造的对象。人们心怀感恩,谨慎探索自然的奥秘,遵从自然规律采取行动,探求与自然共生之道。在这一生存法则指引下,先民记录了“春候地气始通,椓橛木,长尺二寸;埋尺见其二寸。立春后,土块散,上没橛,陈根可拔。此时二十日以后,和气去,即土刚。以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氾胜之书》)的农耕规律,收获了“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的耕种技巧。随着现代化浪潮加速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枢纽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将人类社会秩序强加于自然,开始对自然大规模、无限制“立法”。过度追求集约化、规模化、市场化、农场化的经营机制,会产生破坏自然界本身能量转换和生态平衡的意外后果。与此同时,“顺兴天道,和谐共生”的优秀农耕理念仍能够得以传承,成为发展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支撑:在浙江宁波,“稻蟹共生”的综合生态养殖模式被广泛应用,通过蟹和水稻的共生,解决了水稻的草害和虫害问题,借助传统农耕设计实现了一地双收;在上海松江,大规模集中经营的现代化家庭农场里,经营者依旧遵循“休耕换种”的自然规则,精妙的农业制度安排成为保养地力的最佳途径,传统农耕智慧与先进现代农业经营理念相得益彰,堪称精细化管理的创新之举。可以说,“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内在逻辑。

(二)农耕家庭的道德风尚——父慈子孝、耕读传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作为传统家庭观念的代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促进家庭成员互信互爱、维护家庭内部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价值,并由此构建起基于“家本位”的坚固、持久、富于生命力的命运共同体。家庭成员之间“慈爱孝悌”状态的达成和维系,与日常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在古代社会,受制于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加之劳动强度较大,长辈主动承担起辛苦劳作、抚养儿女的家庭责任。与此同时,教育水平低下、传承途径匮乏决定了晚辈对农事生产规律的把握多依赖于长辈田间地头、茶余饭后的悉心指导,由此在传统农耕社会及其生产生活氛围中逐渐形成“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大学》)的传统,“父母恩勤”收获“寸草春晖”的反哺,家庭角色与责任得以诠释。这套伦理风尚世代相传,成为内嵌于传统农耕文化的家庭道德基因。此外,在古代社会,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也大多怀有“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热忱,“半耕半读”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生活方式。“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训子语》),诉说着农耕家庭虽身处社会底层却不坠青云之志的情怀和抱负,守耕与漫思锻造出奋发图强、追比圣贤的家门风尚。时至今日,人们游走四方,心中仍会情系桑梓、思念家人,难忘乡愁。通过寻根问祖与落叶归根,旨在回归“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家庭生活,找寻“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耕读时光。可以说,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剧烈的时空压缩和社会变迁,并未吞没传统社会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的理想情结和“父慈子孝、耕读传家”为代表的伦理观念。它们早已凝结为满溢着乡土气息的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汇入“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源流,植入每一个体成长的生命体验之中,深刻关联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

(三)基层社会的乡邻关系——同甘共苦、守望互助

作为广泛存在于乡土中国的地缘关系,乡邻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古人依赖土地解决生活生产问题,过着传统而又简单的生活,邻里乡亲于同一片土地之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的共同守护和辛勤耕耘孕育生成同甘共苦、守望互助的精神家园。马克思认为,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在实践中生成,进而在这种互动中建构了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135在传统农耕生产过程中,这种社会交往关系尤显密切。这是农业自身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所决定的。虽说农业生产相对较为自由,然而劳动的绩效却不能立竿见影,甚至并不会出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美好愿景。在生产和收获之间,还要经历时间的考验。一次天灾或者一场战乱,都可

能让一整年的辛勤付之东流。这种生产和生活的不确定性,要求邻里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因为面对自然和时势的瞬息万变,个体实在太过渺小——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乡邻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情感联结在“守望相助”中升温,最终形成建立在彼此熟悉、互相信任、团结互助基础上的乡村命运共同体。诚然,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在社会变革浪潮的推动下逐渐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即便在农村,“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人际疏远现象也不足为奇了。但不可否认,人们依然对“隔竹每呼皆得应,二心亲熟更如何”的邻里关系和“蒸梨常共灶,浇薤亦同渠”的淳朴乡风心驰神往,这正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保有和重塑传统农耕文化所内涵的伦理之维。

(四)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人的劳动再生产了整个自然界。这种创造性的人类实践活动,也同步塑造着人的精神世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7]161 同时,他也认为,尽管人同任何其他存在物一样须臾不能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然而自然界“直接存在的形态”却很少能直接服务于人的生存发展。这就需要人通过现实的劳动,通过自身的生命力与对象化自然之间进行密切的物质交换,才能获得满足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得体地生成为人。璀璨的华夏文明就始于这种坚持不懈与自然抗争、勤勤恳恳向幸福迈进的农耕生产。“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农耕民族勤劳勇敢的生活态度渐化为中华儿女的精神风骨,孕育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遵从自然规律来改造自然,这是人与其他生物相区别的显著特征。先民首先是在对自然的绝对崇拜中顺应规律、求得生存,再积极探索、逐渐累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经验,将生存与发展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我们以往多是在对汉民族的意义上讲自强不息是最能代表我们民族品格的精神,其实,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本就是一个吸纳接受的演化过程,政治上的标准是接受以周礼为代表的一套政治秩序,经济上的标准就是变游牧为农耕。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包括各民族同胞在内的世代耕耘的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内核。坐落于云南省哀牢山区的哈尼梯田,是首个以民族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上的哈尼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千载梯田生产生活的艰辛历练,给予哈尼族先民关于自然万物生存发展的渊博认识和丰富经验,通过言传身教的世代传唱,将与自然相处的伦理规约和实现生存发展的传统智慧汇集为一部《哈尼四季生产调》[18]。每逢丰收时节,梯田稻浪滚滚,绵延 2 000 多级阶梯,蔚为壮观,这正是哈尼族同胞 1 300 余年不懈奋斗的杰作。“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体现了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命脉,更作为民族精神的精髓内容,驱动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艰难坎坷,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传统农耕文化契合乡村振兴的伦理向度及其张力

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既应置之于对广袤乡村复杂境况的深刻考量,也应融入到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伦理反思之中。中国的改革进程始于农村。农村的全面发展意向(主要表现为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和自我发展能力,造就了 1978—1984 年间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收窄的良好开局。随着 1984 年改革中心转入城市经济和工业领域,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发展水平再次拉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再次出现。到 20 世纪末“三农”问题浮出水面后,21 世纪初明确提出的“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理念和新农村建设战略,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基础设施等外部条件有所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乡村发展最为关键的内生动力仍有待激活。长期置于“城市目标导向”框架中的中国乡村,在城乡二元体制这一强大“阻尼”的遏阻之下,往往发生强势“城市中国”与脆弱“乡土中国”的狭路相逢,后者的话语权缺失在意料之中[19]。新时代乡村发展之路在何方?梁漱溟先生曾一针见血道破玄机:“除了乡下人起来自救之外,谁也救不了乡村;单靠乡村以外的人来救济乡村是不行的。”“本身有生机有活力,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20] 在当下,乡村振兴固然能够使乡村成为满足城市追求高质量发展和美好生活需要的优质农产品基地,成为提供城市发展所需劳

动力大军的“蓄水池”,甚至成为逆全球化黑云压城之际缓解就业压力、转嫁城市资本危机代价以获得城市经济“软着陆”的“减压阀”[21]……但必须强调的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基础上的乡村振兴战略,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确立乡村的自足性价值,让乡村复归其主体性地位。毫无疑问,这是党和政府在乡村发展理念上的一次创新性转变,从过去被动依靠城市辐射、从城市端来激活乡村,到主动转型、打造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模式的指导思想跃迁。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就是立足于乡村自身的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禀赋,复归农业农村的主体化地位,从而破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困境,构建起一种与城市地位同等、双向互促,达致“城乡同此凉热”的命运共同体。这一过程的核心环节在于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而与这一进程相伴始终的必然是本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交织纠缠。因而,在由乡村振兴战略引领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之中,如何对待这种乡村文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充分挖掘传统农耕文化契合乡村振兴的伦理向度及其张力,理清传统文明在现代化方案中的存续意义和本源价值就显得尤为关键。

(一)二者都直接面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之问

正确理解并科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几千年农耕民族思考的难题,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人与自然的相处法则可分为三个维度。

1.敬畏自然,永远保持对自然界的感恩之心。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产物。”[22]自然孕育了人类,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对于这种与自然界直接对话中生成的文明形态而言,尊重和敬畏自然,永怀对天地万物的感恩之心,是其应有之义。悠久的农耕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传承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头顶天空告诫人们莫忘敬畏,脚踏大地提醒人们心怀感恩,这绝不是一种对自然万物或自然力量的蒙昧与盲信。这种基于亲近自然的传统信仰,应当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格局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2.以“度”为前提的取自然之力为我所用。马克思认为,实践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人类充满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使人在本质上与其他动物相区别。“这种生产是人类的能动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4]274 人既是自然的“奴仆”,又通过劳动这一手段吸收自然力为我所用,成为“主人”的角色。然而,当人类开始想要去驯服自然、为其戴上“枷锁”的时候,这种原本的和谐统一关系也就开始被瓦解和异化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实质,是以宏大的资本逻辑为主线而展开的人类历史。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23]伴随这种资本财富积累进程的,是对自然资源的疯狂贪婪和肆意掠夺,是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无底线挑战。由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浪潮,将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扩散至全球范围:一方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零和博弈”让生态危机变为世界性难题,另一方面是资本危机遵循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而向外部转嫁。破除这一困境、消除人类社会的发展困惑,需要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主宰与束缚,从历久弥新的人类文明智慧中寻找启示和指引。而在与世谐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对于这类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有着丰富的思想质料和精神资源。古老的华夏民族在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掌握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密钥,早已摒弃了靠掠夺自然、征服自然来获取满足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转而择取“道法自然”“仅取盈余”的实践法则。这种文化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后工业化进程对自然资源的殖民式掠夺,农耕民族教诲子孙后代珍惜物质、珍惜自然,由此形成具有“安土重迁”特色的小农经济形态。农民掌握“天时地利”的耕种规律,取自然之力求得生存,也懂得对自然资源的“有度”使用,避免人与自然的“零和”冲突,实现生生不息。乡村振兴战略理应借鉴和吸收这种以“度”为前提的取自然之力模式,充分利用乡村本土资源,激活内生动力,走乡村特色的振兴之路。

3.充分认识并科学利用自然规律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农耕文化内涵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健康共生的生态伦理,其终极目标是追求熟知自然规律、践行人与自然共生之道基础上的“天人合一”,这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是农耕人的一种空想,通过不断发展更新的生态科技,不断完善的生态伦理体系,其现实可能性及路径已十分清晰。要消解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生

态问题，达成“生态宜居”的目标和要求，必须正视优秀传统农耕文化，重构乡村生态伦理，以追求人与自然“和合”的生命态度和人道实践，加速农耕文化传承的时代化进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二）二者都深刻关联“如何规定人与人的关系”的哲学命题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错综复杂的交往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处理社会关系实践也因此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传统农耕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都生发于充满人际互动的人类社会内生关系结构，并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摒弃了个人中心主义，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中国人历来有重视家庭、家族的传统，是“伦理本位的社会”[24]。这种文明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传统说明中华文明绝不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不鼓励唯我独尊的个人中心主义，而是以无与伦比的包容性、以强大的集体力量行动，强调社会公德的核心地位和教化作用。从事农事劳动的祖祖辈辈推崇“礼让和谐”“同甘共苦”等伦理法则，在家庭成员之间、乡邻朋友之间始终维系一种“和合”的默契氛围，从而构建一种友善的共同体关系。而西方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扩展过程中，存在诸多排他性、掠夺性逻辑，乃至结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恶果。由此也形成了资本主义文明中关于人与人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认同的异化，推而言之，地缘政治中的霸权思维和修昔底德陷阱的陈腐观念，至今仍主导着西方某些国家的外交思路。

随着全球性文化交流互动愈发频繁，基于农耕文化传统的中华文明在融入现代性的挑战与应战中，以其强大韧性与活力，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中华传统农耕文化关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阐释，是一种人与人相处的伦理信任和价值规范的凸显，复归并阐释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阐释一方面体现为家庭成员关系处理。传统的家庭慈孝伦理在农耕生活中生根发芽并逐渐成型，先民以“耕”开新，以“读”固本——不仅追求以“耕”养家糊口，勤劳致富，还懂得以“读”知书达理，修身养性。依赖耳濡目染加之谆谆教诲使得农法技艺得以传承，同时生成了农耕民族独有的家庭文化——对“长辈”“兄弟姊妹”“儿女”的家庭角色的精确定位，对家庭责任和义务的直接诠释，对家庭成员关系和谐的深层理解。中华传统农耕文化关于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解读，另一方面也体现为乡邻成员关系处理。对于农耕民族而言，人不是孤立的劳动者，“同甘共苦、团结互助”的现实具象随处可见——遇到困难，集体出谋划策；迎来丰收，众人把酒言欢。简单朴素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成了和谐的乡邻关系。淳朴的民风成为传统乡村道德文化的根基，潜移默化地浸润、规范着乡民行为。这也正是乡村振兴战略把“乡风文明”置于重要位置的基本考量。这种人与人的良性实践互动形成了彼此休戚相关的文化，科学诠释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哲学命题。

在消费主义与逐利主义充斥全球的当今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裂变、异化，父母子女反目成仇、左邻右舍闭门不见的冷漠现象并不鲜见，现代性冲击、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信任，货币——这种异己的本质力量统治了人，给人际关系蒙上利益、工具及单向度的价值面纱。可以说，“当代农村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且解决乏力，归根到底，其根源在于农民乡土生活意义的被消解和传统伦理文化价值的被抽空”[25]。在这个意义上，寻找彰显“命运与共”的传统智慧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在乡村基层社会复归、重构充满和谐氛围的人际互动，形成欣欣向荣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显得尤为现实而迫切。

（三）二者都内在具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

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最终都要回归到对人本身的思考。马克思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毕生追求，寓意正在于此。他深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提出需要跨越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扬弃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方能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4]297。近现代以来，现代性浪潮席卷全球，历史进入以交换价值为全面媒介的商品社会。利益的驱动空前发展了人的理性与主体能动性，由此也带来了“物的依赖性”，资本和利润侵蚀、冲击了人的本质精神，也揭开趋向“人的自由”前进运动的历史序幕。而在这个过程中，只有通过愈发明晰的现实变革，通过不断复归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社会性，实现从自然力、社会关系、物化统治束缚中的人向独立的、完整的人格的过度，人才能自由地发挥其本质力量成

为全面发展的人。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和乡村振兴的深层精神寓意,皆旨在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幸福。同时,这种寓意澄明和彰显了一种理想精神,亦铺展为一场现实运动。一方面,筑造美好家园的共通性理念造就了“人的解放”的必备环境。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膨胀引发对自然无限利用和强加控制的观念盛行,随之而来的则是人对自然资源、能源愈发贪婪,不断触碰自然的底线,“人们多次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接受自己的后果陷入更深的自然束缚之中”[26]。乡村振兴战略是以复归人与自然关系为旨趣的发展,打造“美好乡村”的战略目标与农耕时代追求“和谐共生”的生活愿景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共通,最终指向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另一方面,追求“生活富裕”的统一性实践筑牢“人的解放”的现实大道。从先民在艰苦卓绝的物质条件下“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到当下为实现美好生活向往而不断奋斗,可以说,人们对“生活富裕”的追求从未间断,并被不断传承延续、升级进阶。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所要求的“生活富裕”,已然不简单是一种物质财富的要求,而是一种追求更加平衡、充分、全面的“丰裕”,这为实现“人的解放”提供更大的现实可能。当代中国正处于“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性双重交织”的历史时代,消费文化盛行、公平正义缺失等社会弊病威胁着人的生存质量,也扰乱了人的发展方向。在基层社会,开辟弘扬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帮助农民深化对自身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引导农民更积极地参与现实的生活与交往,落脚于乡村振兴的现实任务,不仅有助于消除现代性所固有的缺憾带来的社会挑战,也必将加速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自由人联合体”状态的到来。

四、传统农耕文化嵌入乡村振兴现实之道及其展望

“中国广袤的乡村积淀着千百年的农耕文化,浓缩了中华文明的变迁历史,就像构成中国人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同时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兴盛衰微和前途命运。”[27]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论述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在农村土生土长,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真实记录和鲜明再现;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为解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之问应时而生,是对基层社会充满人性关怀的现实行动。在新时代探索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渗入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国方案,用传统农耕文化续写现代乡村故事,是激发乡村内在的强大动力,加速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必然之选和必由之路。

(一)汲取农耕智慧发展现代农业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必然面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碰撞与交流,而农业文明正是在现代性的发育与调适中被不断重构和延续。农耕文化本就是关于农业发展的历史记录,内涵着农业生产生活的丰富经验和技巧,将其中有关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优秀理念植入现代农业发展实践,实现“优质、高效、安全”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符合当代人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中丰富的物质遗产。传统农耕器械(锄、织布机、石磨等等)在今天的农业生产特别是农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仍然可以发挥作用;杂交水稻的育成离不开野生水稻的配种,传统的农作物品种(水稻,玉米,小麦等等)可以作为未来的农业基因进行储备,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意义重大;此外,作为珍贵的农耕文化遗产,祖先留下的巧夺天工的传统农业工程,理应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继续予以重视。笔者曾在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挂职扶贫,红河南岸的哀牢山深处,哈尼族人民在世代生产生活实践中探索出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森林涵养水源,村寨升腾人气,梯田提供食粮,水系润泽大地,彼此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经历1 300多年开垦最终打造成型的哈尼梯田,如今依然能够在农业现代化转型浪潮中以种植水稻、养鱼养鸭等方式直接发挥生产作用,高效地提供原生态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尼梯田在吸引大批游客观光旅游之余,成功打造出“梯田红米”“梯田黄酒”“梯田鸭蛋”等特色农业品牌,并通过电商平台推广至海内外市场,为当地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要积极弘扬农耕文化蕴含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革故鼎新的现代社会,传统的农耕技艺和管理经验并未过时,千锤百炼的实践得来的生产智慧仍可很好助力农业结构升级。汲取优秀

农耕理念和经验，嵌入循环、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亦可体现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当代价值。前文提及的位于上海松江的现代化农场，“三三制”轮茬制度已实施多年。我们在调研访谈中注意到，这种“三三制”原则贯彻得十分到位，一季水稻过后，在第二季，1/3 种小麦或大麦、1/3 种红花草（绿肥）、1/3 作为白地（深翻），并采取补贴措施加以助推。三个大户为一组，每年轮换，恰巧做满三年一个承包期。政府的适度介入和规划引导，与农业生态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农民之间的内生需要紧密咬合在一起，客观上促成了一种新型的互助关系。这一做法与其说是现代农业的创新，毋宁说是对千百年来的传统农耕智慧的忠实传承与创造性转化。

（二）推广农耕理念建设美丽农村

“中国的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乡土社会的生活富于地方性的色彩，终老是乡成为生活常态。”[28] 现代都市生活的单调乏味、千城一面，也促动越来越多的人们远离钢筋水泥，倾心故土田园，这既是一种对现代性压抑的抗争，也隐含着对美丽乡村美好生活的内在欲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29] 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美丽和谐的生态越来越成为新时代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是山川河流、故土家园孕育出的文化，深刻蕴含着中华民族对自然万物、人的本质及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现代化美丽乡村的构建也当然能够从这种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一方面，农村的就地现代化需要在观念维度上培育和弘扬农耕生态理念，提高吾土吾民的文化素养和生态自觉。传统农耕文化呈现着对自然的真诚感恩和热忱礼赞，是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逻辑的文明形态。这种以“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为追求、以平衡有度为原则的“和谐发展”模式，完美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农村的就地现代化需要在实践维度上广泛应用和推广农耕生态技法。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既带来强大的驱动力量，但其“双刃剑”的特点也要求人们审慎应用。而以“适度守则”“和谐共生”为伦理法则的传统农耕生产，其技法富于生态特征。在珠三角地区，“桑基鱼塘”早已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形式，通过将种桑养蚕与池塘养鱼相结合，在池塘边上种桑树，用桑叶养蚕，以蚕蛹等作为鱼饵，然后又用池塘底部的泥作为桑树的肥料，由此形成一种生态环保且利用率高的生产经营模式。传统的农耕方法既很好服务了乡村农业发展，又自觉参与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面对现代化浪潮中某种程度上被异化了的乡村生活和生产方式，传统农耕文化提供的绝非一种梭罗式的乡间隐居方案，而是更加坚定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与自然“交往”的默契，找寻农村现代化的伦理和现实双重支撑，建设人与生态的“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三）传承农耕文化助力农民富裕

“农民富”，凸显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性关怀和价值立场。这种“富裕”不仅体现为经济层面的宽裕，也理应包含一种发展更趋平衡、充分和全面的精神富足与文化丰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30] 文化发展的同质化与多样性之间的巨大张力及其内在反思，理应内嵌于乡村振兴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孜孜以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之间并非对立，而是有着宽广的包容空间。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传统农耕文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能“看家育人”，还能够嵌入乡村治理，引导基层社会形成家庭和睦、乡风文明的新风尚，实现新时代农民群众对更高品质生活的向往。

一方面，优秀农耕文化内涵的家庭伦理对建设优良家风、构建和谐家庭环境具有现实意义。“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31] 浙江省平湖市新埭区虽位于江南水乡一隅，但“耕读”传统盛行，当地人崇尚“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葆有“耕读成家”的价值追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泖水好家风”特色招牌已经成为平湖万千家庭家风家训形成的基石。此外，当下的优秀农耕文化嵌入家庭治理，也面临着因家庭成员的分离导致亲情关系疏离的现实困境。乡愁，不应仅仅是市民在城望乡的一种虚幻镜像，更应利用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天然亲和力和感召力，通过传统慈孝故事宣讲、优秀家风体验活动等形式，重拾对家庭观念的深刻记忆、重塑“家文化”的生长空间、重建乡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吾土吾民的情感联结，最终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重构家庭伦理美好风尚。

另一方面，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内涵的的村社伦理为建设文明乡风、构建和谐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

现实参照。文明乡风的养成需要接地气、有人气的政策设计,这种源于乡土内部、关乎乡民自身的文化传统,能够自然渗入基层治理体系之中并发挥效力。在安徽广德,当地的农耕文化旅游节已举办多年,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风景秀丽的月克湖畔举办集体婚礼,新人们通过这种简约的方式告别婚事铺张浪费的陈规陋习,传统农耕文化中自然内涵的"勤俭节约"理念发挥了引领移风易俗、打造乡村文明新风尚的重要作用。此外,弘扬团结、协作、共富等优秀农耕价值理念,以传统农耕知识宣讲、农耕文化遗产展览、农耕技能大赛等方式,将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凡此种种,都是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之举。

概而言之,充分利用农耕文化的本土优势,关注和呼应民众对山川河流、对故土家园的留恋和向往,汲取和弘扬农耕社会处理乡邻关系的伦理精髓并将之嵌入乡村社会治理,营造"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基层文化新生态,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基于中国传统、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2] 农民日报社论.为丰收喝彩 为农民加油[N].农民日报,2018-06-22(01).

[3] 张雄,朱璐,徐德忠.历史的积极性质:"中国方案"出场的文化基因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9(1):4-21.

[4]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79-89.

[5]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

[6] 曹东勃.现代农业的困惑[J].读书,2010(5):11-17.

[7] 乌尔里希·贝克,伊利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

[8]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305.

[9] 何绍辉.货币下乡与价值错乱——兼论天价彩礼的形成及其社会基础[J].中国青年研究,2017(9):42-48.

[10] 张雄.市场经济中的非理性世界[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210.

[11] 陈锡文.充分发挥乡村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N].北京日报,2019-02-25(18).

[12] 李根蟠.农业生命逻辑与农业的特点[J].中国农史,2017(2):3-14.

[13] 曹东勃.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助力乡村振兴[N].解放日报,2018-09-25(18).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 任继周."时"的农业伦理学诠释[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8.

[1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8] 张红榛.哈尼族四季生产调解读[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5.

[19] 朱霞,周阳月,单卓然.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的策略及路径——基于乡村主体性视角[J].城市发展研究,2015(8):38-45.

[20] 梁漱溟全集(第1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616-618.

[21] 温铁军.八次危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6.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0-411.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9.

[2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0.

[25] 张燕.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式微与转型——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J].伦理学研究,2017(3):115-119.

[26] 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

[27] 王东,王木森.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共享理路[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3):1-9.

[28]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10.

[30]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05.

[3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N].人民日报,2015-02-18(01).

Farming Culture: Ethical Conno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O Dongbo, SONG Rui*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line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emonstrates strong meaning of modernity. The inner paradox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calls for the return of traditional farming culture. It further develops, integrates, and sublates modernity in this proces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farming culture of China is the essence of laboring people's life and production practic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t collects and gathers the wisdom of the Chinese people about human and nature, one and others, one and oneself, which mainly includes four part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ollowing the rules of nature and keeping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 traditional family virtu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son and the tradition of paying attention to both farming and reading; the neighboring relationship of sharing joys, sorrows and helping each other; the striving spirit of diligence, courage and unremitting self-improvement. It has far 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o fully explore the logical connection and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the excellent farming culture and the ethic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ways tha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farming culture can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farming culture; agricultural ethics; the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马欣荣）

（上接第 143 页）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Farmer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ion Behaviors

QU Meng, ZHAO K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538 farm households in major grain-producing areas in Shandong province, on the basis of measuring the index of economic status of farm households, using stepwise regression and deviation correction of nonparametric percentile bootstrap intermediary function test method, analyze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farm households, the direct impact on their behavior of reduction of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through its value perception of farm households, indirect influence on their behavior of reduction of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and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of value perception of the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duction of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status of farm household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reduction of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and the value perception of farm household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reduction of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value perception on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reduction. The self-serving values of farm households play a positive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influencing the reduction of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while the altruistic values and ecological values play an in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influencing the reduction of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Key words: socioeconomic status; value perception; reduction of fertilizer application; reduction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

（责任编辑：张洁）